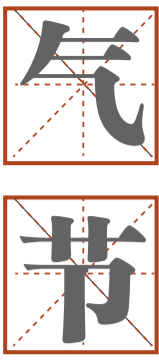


《素竹幽兰》(明)马守真作



何谓气节?气节又被称为名节、节操、德操、志节等,是指一个人为人处世在道德上、政治上的原则性和坚定性。当一个人面临义与利、身与仁、生与死的考验时,能够做到遵仁循义、不惧生死,甚至愿意以生命为代价维护自身所信仰的道德理想和道德原则,所体现出的即是气节。气节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,历代先贤皆视气节如泰山,在他们看来,只有“临大节而不可夺”者,才称得上是有道德的人,也才能真正称之为“君子”。气节蕴含的是一个人的精神信仰,是士人君子昂然于世的内在精神风骨。

坚秉公理 义无反顾
修养捍卫真理正义的勇气

东汉清流领袖陈蕃从小就立下了“大丈夫处世,当扫除天下”的志向。东汉末期,官场昏暗不堪,许多读书人都选择了独善其身,或退或隐,陈蕃却选择了急流勇进。《世说新语》记载:“陈仲举(陈蕃字仲举)言为士则,行为世范,登车揽辔,有澄清天下之志。”

陈蕃在处世上是非清晰、黑白分明,十分坚持原则。他任乐安太守时,权倾天下的大将军梁冀派人给他送信,有私事请托,信使仗势刁横,他将信使痛揍一顿,“鞭答至死”。

陈蕃任光禄勋时,桓帝对宠臣外戚兰施封爵赏赐,他生气地指责“日月失度,阴阳错乱,稼禾不熟,民财不丰”;桓帝耽于享乐,他批评皇帝连年加重征赋,百姓饥寒,生活困苦,而皇宫外宫女数千,食肉衣绮,油脂粉黛等各种开支不可统计;桓帝喜欢狩猎,他批评说:“田野空,朝廷空,仓库空,是谓‘三空’。加兵戎未戢,四方离散,是陛下焦心毁颜,坐以待旦之时也。岂宜扬旗耀武,骋心舆马之观乎!”“三空”再加上用兵不止,四方百姓流离失散,这正是您伤心憔悴、夜不能寐之时,怎么能耀武扬威、醉心于车马驰骋的场面呢?”

陈蕃任太傅并总理尚书台后,便联合大将军窦武铲除毒朝政的宦官势力,他上疏奏太后,指名道姓陈说宦官侯览、曹节、公乘听、王甫、郑飒等人的罪恶,并且毫不避讳地说:“希望把臣的奏章给您左右的人看,并让那些坏家伙知道我痛恨他们。”后来宦官们先下手为强,劫持了汉灵帝,大肆捕杀相关大臣。消息传来,人们劝陈蕃赶紧躲起来,已经七十多岁的陈蕃不顾劝阻,断然率领属官和学生八十余人,一起拔刀冲进承明门,找宦官理论,最终为宦官所害。

《后汉书》的作者范曄评价他:“功虽不终,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。汉世乱而不亡,百余年间,数公之力也。”汉朝乱而不亡,又延续数十年香火,就在于有陈蕃这样身体理想、不避刀斧的人勇于前赴后继,让信仰与大义之火代代相传。

气节是在大义面前临危不惧,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的勇气。自古以来,所有的气节之士无不以勇闻名于世,像陈蕃,为澄清天下而赴汤蹈火、虽死不惧;像苏武,“卧起操持,节旄尽落”,而慨言“屈节辱命,虽生,何面目以归汉”;像夏完淳,为抗清年仅十七岁就血洒刑场,却慷慨而书“英雄生死路,却似壮游时”。

不得不说,在生与死的剧烈冲突面前能够守住自己的气节,是需要临危不惧的勇气来支持的。所以,孔子特别重视勇敢、勇气在道德实践中的力量,提出“见义勇为,无勇也”。他还提出了“三达德”的思想,认为“仁者不忧,知者不惑,勇者不惧”,只有具有仁、智、勇三种品行的人,才具备了完全的人格,才能成为真正的君子。

孟子则更进一步把勇分为血气之勇与义理之勇,所谓“血气之勇”,是好勇斗狠,做事凭一时冲动;而“义理之勇”,则是为了真理和正义坚贞不屈、百折不回。毫无疑问,义理之勇才是真正的勇敢,表现为“义之所在,不倾于权,不顾其利,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,重死持义而不挠”,意思是说,一个有气节的人,只要认准道义之所在,就会不屈服权势,不顾及利益,就算全国的人都敌视他也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看法,虽然看重生死,但为了坚持正义,决不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屈服。这就是荀子所称的君子之勇,有了这样的勇气,才会有临危不惧、视死如归的气节。

总之,气节作为一种道德人格的精神气象,体现了一个人至高尚的道德水平和道德境界,赋予了生命以崇高的意义。在今天这个时代,修养气节的精神品质和道德情操,对于弘扬传统文化中的道义精神,培养民族气节,使我们成为具有独立人格和内在精神风骨的人,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君子内在的精神风骨

王爱军



(明)王毅祥作
《四季花卉图卷》(局部)

临危不苟 舍生取义
修养坚守民族大义的正气

宋端宗景炎三年(1278)冬,文天祥在抗元过程中兵败被俘。元将张弘范屡次劝他投降,还令他写信招降另一抗元将领张世杰,文天祥说:“我不能保护父母,还教别人背叛父母,可以这样做吗?”之后他写下了著名的《过零丁洋》一诗,张弘范在读到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时,知道文天祥不会屈服,便不再逼迫他。

第二年,崖山海战失败后,张弘范又劝文天祥说:“丞相的忠心孝义都尽到了,若能改变心意,像侍奉宋朝皇帝那样侍奉大元皇上,就不会失去宰相之位。”文天祥含泪说:“国家灭亡却不能补救,作为臣子,死有余辜,怎敢怀有二心苟且偷生之情?但今日事到这里,于义当死,乃是命也。奈何?奈何!”后来忽必烈还不死心,亲自出马,问他有什么愿望,文天祥回答说:“天祥受宋恩,为宰相,安事二姓?愿赐我一死足矣。”文天祥得到了大宋的恩泽,做了宰相,怎么会服侍第二个姓的君主呢?希望赏赐我一死,这样我就满足了。面对视死如归的文天祥,忽必烈无计可施。1283年1月,文天祥面朝南,在柴市从容就义。

文天祥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官中为奴,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,而他只要投降,家人即可团聚。但文天祥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,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:“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?但今日事到这里,于义当死,乃是命也。奈何?奈何!”后来忽必烈还不死心,亲自出马,问他有什么愿望,文天祥回答说:“天祥受宋恩,为宰相,安事二姓?愿赐我一死足矣。”文天祥得到了大宋的恩泽,做了宰相,怎么会服侍第二个姓的君主呢?希望赏赐我一死,这样我就满足了。面对视死如归的文天祥,忽必烈无计可施。1283年1月,文天祥面朝南,在柴市从容就义。

在历史上,文天祥是颇受儒家知识分子推崇的“气节”之士。气节首先是一种“临大节而不苟”的正气,就是当民族或国家遭受外敌入侵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,能够临危不苟、威武不屈、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。生命固然足惜,但还有比生命更值得珍爱的东西,这就是道义,孔子将其描述为“志士仁人,无求生以害仁,有杀身以成仁”。

这种浩然正气所根植的底蕴是志向。孔子说“三军可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也”,当人身处危境或关键时刻,能够坚守志向而不屈服,不苟且偷生,而是慷慨赴死,成仁取义,就是因为有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”的崇高志向作为内在的支撑。

因此,修养气节首要的就是做到“尚志”。何谓“尚志”?孟子说:“仁义而已矣。”通俗地说,尚志就是士人君子应把成为仁义之士作为道德理想和崇高志向,赋予自身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,心有所主则不为外物所易。

文天祥在《言志》诗中曾写道:“杀身慷慨犹易免,取义从容未许轻。仁人志士所植立,横绝地维屹天柱。以身殉道不苟生,道在光明照千古。”正因为有了“杀身以成仁”的志向,他才有

了以身殉道、决不妥协的决心。高远的志向是气节的根基,如果离开了高尚的道德理想和人格操守,就失去了所追求的目标、所持守的方向。所以,立志是气节的第一要义。

立操以仁 守志持身
修养淡泊功名荣辱的骨气

宋神宗熙宁三年(1070),苏颂被任命为知制诰,负责起草诏令。虽然干的是秘书的活儿,但只需顺势而为,便有无限的政治前途。秀州(今浙江嘉兴)判官李定通过攀附王安石,被宋神宗越级提拔为监察御史,并令苏颂起草任命诏书。苏颂却予以驳回,理由是官吏的任免应按章办事,然而“今定不由铨考,擢授朝列;无缘御史荐置完台”,未经正常的考察、推荐程序,而且“不惟超越资序,未压群言,抑亦有乖国朝从来法制”,轻率越级提拔,不仅令人心不服,更重要的是违背法制。

神宗说:“去年我就曾下诏,朝中选官不必拘泥于官阶高下。”再命苏颂起草。苏颂认为把李定从地方上调到中央担任京官,已是优恩,若还让其任御史台这么重要的部门工作,自先朝以来,未有此例。而且更大的问题是,“幸门一启,则士涂奔竞之人,希望不次之擢,朝廷名器有限,焉得人人满其意哉”。因此,苏颂再次选择了拒绝。神宗生气地威胁说:“久格诏命,恐将得罪,卿宜思之。”抗旨不遵,将是什么罪过,你可要想清楚。苏颂依然不为所动,淡然地回答:“我听说治理之道在于考察臣下的奸邪与正直,而区分奸邪与正直的标准就在于他的操守。现在我所坚守的是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,如果因为害怕受到你的惩罚就改变立场,那是奸佞之人所为,我是不会那样做的。”就这样,苏

颂因不肯失去内心的坚守,前后五次抗旨封还词头,直到被免职,也不肯起草诏书。

气节是一种抛却个人荣辱,即使面对强权也坚持守志持身的骨气。在儒家思想中,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云烟,甚至事业文章都会随着生命的逝去而灰飞烟灭,但唯有人的精神“万古如新”,具有永恒的价值,这种精神就是气节。所以他们特别强调为人重在大节,名节重于泰山,人生短暂而气节千载,断不可毁节求荣,毁节求生。

如何成为气节之士呢?儒家提出要做到持义守道。“义”与“道”是气节的核心和灵魂,气节所展现的思想内核也恰恰是士人对于道义的坚守。何谓义?在孔子看来,义指合宜、应当、应然之意,“君子义以为质,礼以行之,孙以出之,信以成之,君子哉”,意思是君子以义作为根本,用礼加以推行,用谦逊的语言来表达,用忠诚的态度来完成,这才称得上是君子。义在整个儒家伦理道德中,是作为君子最为根本的行为规范和道义原则而存在的,“道义”的本质就是正确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取向。

气节之士与普通人的最大差别就在于,他能够在日常生活实践和价值选择中,始终以道义作为选择的标准,始终坚持道义原则而不动摇,特别是在面临个人荣辱、功名利禄的考验时,能够持守道义,而不是见利忘义。

穷不失义 达不离道
修养无视贫贱富贵的傲气

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出身名门,曾有着“猛志逸四海”的志向。他淡泊功名,为官清正,因不愿与腐败官场同流合污,数度辞官。后来因为仅靠耕种田地,难以养活一家老小,亲戚朋友都劝陶渊明出去谋个一官半职,迫于生计,他只好答应了。

了大怒:“皮儿和馅儿有什么不同?我见你在乡下种田,衣着破旧,想必一定能体会农民的艰辛,所以推荐你去官府上班。不料你的虚浮不实竟然超过了那些纨绔子弟。”说完让他将饼皮儿捡起来。

侄孙惊慌失措,颤颤巍巍地将饼皮儿从地上捡起来。郑澆接过饼皮儿,自己全部吃掉了。最后,郑澆送了这个侄孙几匹绵帛,打发他回老家了,工作的事自然也就泡汤了。

不独是唐人,对于宋朝人来说,吃饼也能体现他们对于粮食的珍惜。南宋的史学家曾敏行也编撰过一本叫作《独醒杂志》的史料笔记,里头记录了一则北宋宰相王安石吃饼的故事。话说王安石做宰相的时候,儿媳家的亲戚萧家公子到了京城并拜访了王安石,王安石邀请他一起吃饭。

到了饭点,喝了几杯酒之后,饭桌上端上来两块胡饼,接着又上了四份肉块。之后就上饭了,还有一碗菜汤。萧公子平时骄纵得很,哪吃得惯这些粗茶淡饭。于是就拿起那个胡饼掏了个洞,只吃中间有馅儿的部分,把饼的边缘都丢在了桌上。王安石见了,啥都没说,只是把萧公子吃剩下的饼边儿拿过来自己吃了。萧公子顿时觉得羞愧难当,坐不交席便告辞了。

一枚小小的饼,引出的故事倒是不少,大都承载着古人对于粮食的尊重与珍惜。的确,一粥一饭,当思来之不易。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从古人吃饼便能体现出来,我们应该将这一美德传承和发扬下去。

在古代,饼是一种重要的粮食。因此,在吃饼这件事儿上,出现了许多和珍惜粮食有关的故事。

北朝时期的将领王罽,生性节俭。王罽镇守地方时,有一次,朝廷派了一位使者来视察。王罽设宴招待使者,宴上就有饼。饼的边缘通常比较厚,口感不好,而中间就比较酥软。使者平日吃惯了山珍海味,用餐时便撕去薄饼的边缘不吃。

王罽见了,很不开心地说:“农民耕种收获,费工颇多,舂米炊火,做成饼子,又用力不少。我看你现在吃饭这么挑剔,大概是饿不饱吧。”于是,就手下把饭菜撤去。使者闻言又羞又惊,惭愧不已。

到了唐朝,饼在餐桌上的地位更重要了。唐人赵璘在《因话录》里说“世重饼啖”。唐朝的史学家就在《贞观政要》里还拿饼来作比喻:“官不得其才,比于画地作饼,不可食也。”任用官员,如果他们的才能配不上职责,就像在地上画饼,只能看,不能吃。唐玄宗年间,鉴真和尚出访日本,粮食里就有“干饼”“干薄饼”“干薄饼”“干薄饼”,可见饼在唐朝人饮食中的地位。

唐朝的饼,类型极其丰富。或许是因为唐朝人太喜欢吃饼了,导致许多和饼有关的传说都出现在唐朝,尤其是月饼的传说。但学者考证,月饼的雏形实际出现在宋朝。所以,唐朝的饼或许很圆,能令人联想到月亮,但和八月十五圆系还真不大。不过,唐人的饼里也发生过许多与节约粮食有关的故事。

饼里乾坤大 惜粮践于行

善俊

《新唐书》记载了一个故事,初唐时的宰相宇文士及上得朝堂,下得厨房,拥有一手好厨艺。有一回聚餐,唐太宗便让宇文士及剖肉。宇文士及一边剖着,一边用饼来揩拭手上的肉糜和油渍。见此情景,唐太宗的表情也由晴转阴,瞟了他几次,宇文士及假装不明白李世民的意思,还在那儿傻笑,仍然慢慢地用饼揩手。切完肉之后,宇文士及就把那个饼全吃掉了。很明显,李世民崇尚节俭,不愿看到浪费粮食的行为,而宇文士及通过吃饼打消了唐太宗的疑虑。

唐朝人用饼揩油,应该很常见。唐人李德裕在《次柳氏旧闻》一书中也记录了一个故事。说是唐肃宗当太子时经常陪父亲唐玄宗吃饭。有一次,玄宗让太子切羊腿,太子也一边切肉,一边用薄饼擦刀上的油渍和肉糜。本来开心吃饭的玄宗心情凝重了起来:自己未来的继承人这么败家吗?

好在太子察觉到父亲脸色的变化,切完肉之后就赶紧把饼卷起来吃了。玄宗看了,心中的石头顿时落了地,还高兴地对太子说:“对待食物,就应当像这样一般爱惜呀!”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,《太平广记》

里也有两个。唐初名将李勣,战功赫赫,还被封为英国公。有个老乡来京城办事,去拜访李勣。李勣设宴招待,桌上就有饼。这个老乡也挑食,就把饼的边缘掰掉再吃。

李勣见了,叹了口气说:“年轻人啊,这饼要犁地两遍,下种时弄,收割打场、用磨来磨、用罗来罗,最后才能做成。你这样浪费粮食是什么道理?在我这里我就忍着,如果在皇帝面前,你这样可能就要掉脑袋了!”这个年轻人的脸一下就红了,惊恐、羞愧地说不出话来。

中唐时还有个叫作郑澆的官员,为官正直清廉。他担任河南尹时,有个乡下侄孙找他,想拜托他给安排个工作。唐朝取仕主要是科举考试,但也可以举荐,就是一些高官能向上举荐人才。郑澆德高望重,名声也很好,推荐个人才并非难事,加上这个侄孙穿着寒酸,一看就是过惯了苦日子的,郑澆便答应了下来。

侄孙赴任前,郑澆召集晚辈们一起聚个餐,食物中就有饼,还是馅儿饼,估计里头包了肉。这个侄孙竟然剥掉饼皮儿,丢在地上,只吃里面的馅儿。郑澆见

拾遗

刘伯承:下定决心学俄语

1927年11月,南昌起义失败后,35岁的刘伯承受中共中央委派,从上海来到苏联,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深造。刘伯承一下船,就被告知自己的俄文名叫“阿法纳西耶夫”,进校报到时,他仍在心里默念着这个名字,却发现周围的人都看着他哄笑起来,原来上面已经点到“阿法纳西耶夫”了,他愣是没听出来。刘伯承从此坚定了要学好俄语的信念。

侯宝林:闲章“一户侯”

相声大师侯宝林有一枚刻有“一户侯”三个字的闲章,令不少金石家为之倾倒。有人分析:李白有一首诗“生不用封万户侯,但愿一识韩荆州”,侯宝林是反其意而用之。起初,侯宝林没作太多的解释,问的人多了,他便真诚地说:“没那么深沉,它本意指的是这个院里就住着我一家姓侯的。”

戚继光:士兵淋雨树威信

1567年,抗倭名将戚继光北调,任神机营副将,训练北方士兵。

不过,北方的明军并不服管。无奈之下,戚继光只好从浙江调来3000人的老部队作为嫡系。1569年春,浙兵早晨抵达蓟州时不巧下起了大雨,于是待命站在郊外,没有找地方避雨,更没有进城。直到晚上,浙兵任凭风吹雨打,“植立不动。边军大骇,自是始知有军令”。这3000名浙兵成为戚继光的教导队,以之训练其他士兵,于是蓟州部队战斗力很快实现整体跃升。

“政府”:本意指房子

政府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,指的是国家行政机关。但“政府”一词的本意并非如此。

在唐朝,封建社会各种体制已经成熟,国家政权机构发展确立了负责中枢政务的“三省六部制”。三省是:负责决策的中书省,负责审议的门下省,具体执行的尚书省。三省长官共同行使宰相职权,负责处理国家政务。这些长官日常办公的地方叫“政事堂”,号称“政府”。“府”是官署的通称,亦即百官会集之处。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说:“李林甫领礼部尚书,日在政府。”胡三省《资治通鉴音注》云“政府”即政事堂。这大概是“政府”一词的最早出处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如今,“政府”一词早已演变成为国家行政机关的代名词了。